目　录

回忆我和邓中夏同志在一起……马非百（1）
回忆梁湘芸烈士……陈新宪（12）
缅怀李化之烈士……李春芳（17）
日军侵犯湖南及邵阳沦陷经过……陈新宪（25）
邵阳的沦陷和邵阳人民的抗日斗争……陈　球（27）
邵阳沦陷目击记……苏缉如（43）
敌伪统治下的邵阳……肖新业 蒋业儒（48）
雪峰山战役印象记……肖国汉（55）
李柏荣先生传略……马少侨（59）
日涛文存·轶事四则……李伯荣（74）
记先父魏光焘二三事……魏联石（82）
武冈书画家记略……曾光焱（89）
回忆先父伍菊九及邵阳几位前辈书法家……伍东白（91）
邵阳制锅业概述……罗　础（96）
邵阳皮毛业……封正光（103）
邵东黄花……石旭初 肖新业（115）
毕家造与普爱医院……黄福韶（122）
编后记……（14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回忆我和邓中夏同志在一起

马非百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考取了北京大学文科之后不久，就认识了邓中夏同志。那时他叫邓康，不叫邓中夏。我曾经写有《曦园回忆录》一文，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的《团结报》（十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上面。在这里，我只谈谈几件大事。

一、邓中夏发起创办曦园公寓

那时北大校风不大好，学校宿舍不够住，周围附近都开设了不少商业性公寓。连房租伙食在内，有五、六元一个月的，有八、九元一个月的。学生叫老板为“掌柜的”，叫工人为“茶房”或“听差”。老板和工人叫学生为“先生”。公寓里除一部分人用功读书不问世事外，当时打麻将、逛窑子、捧戏子，成为风气。不仅公寓如此，连宿舍也一样。有一位同学捧上了评剧女主角张××，张××甚至每天演出前，常常坐着马车（那时汽车很少）亲自路过西斋，把这位同学接去听戏，一时引以为荣。

我们组织曦园学生公寓，是以“实行新生活”为宗旨的。

我记得大约在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住在北大东斋。一天，忽然收到中国文学系高年级邓康同学署名的一张以“实行新生活”为标题的油印传单，说是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

公寓，由同学集体直接租用房屋一所，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爨、清洁、卫生、挑水直至掏粪，全由同学自报公认，负责担任。尽量订阅当时本京及外省有进步性的报纸杂志，费用由同学分摊。

我这时并不认识邓康，但在由家来京，路过长沙时，从他的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同学周方的介绍中，是虽未见其人，但久已闻其名的朋友了。所以一看到这个传单，便毫不犹豫地首先向他报了名。从此，我就成了曦园的一个成员，同时也认识了一批良师益友，给我在学习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曦园的地点在东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现美术馆大街北），是一所平房。曦园的名称是邓康提出来，由大家同意通过的。曦就是晨曦，也就是说这个公寓，好比早晨的太阳，是实行新生活一主要是实行“劳工神圣”这一信条的，与其他商业性公寓和宿舍，都有其本质上不同的意思。

报名参加的人数很多，由于房间不够，没有全部搬入。现在能记起来的，计有下列诸人：

邓康，字仲澥，又名大壑，后改名中夏。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四年级。

罗敷阶，字章龙，一字仲言，湖南省浏阳县人，北京大学文预科二年级。

杨人杞，字岂匏，后改名东莼，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

易克嶷，字赓甫，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

张国焘，字恽荫，江西省萍乡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

年级。

刘克隽，字卓吾，江西省安福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四年级。

萧镇湘，字松园，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四年级。

杨亦曾，字辅甫，湖南省新化县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四年级。

刘汇，字百川，直隶（即河北）省××县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四年级。

陈锡，字动和，湖南省邵阳县（现新邵县）人，北京大学数学系四年级。

吴汝明、吴学裴，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旁听生。

杨复时，湖南省宜章县人，邓康前妻之弟，北京××中学学生。

二、曦园公寓的日常生活

公寓中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章。关于各种事务，完全采用自报公议原则。因此，有的人工作比较重，有的人比较轻。对我印象最深的，炊爨全由刘克隽和萧镇湘两人包干。挑水、买菜、掏粪则由陈锡负责。杨亦曾患有严重肺病，就不给他分配工作，但他自己还是要求摆摆筷子、抹抹桌子。此外打扫院内清洁，则大家争着去干，谁先抢到扫帚就归谁干。

房屋分配，一般是两人一间，也有一人一间的。记得邓康和他的妻弟同住一间，我和罗敖阶一间，陈锡、杨亦曾一间，刘克隽、萧镇湘一间，易克嶷、张国焘一间，吴汝明、吴

学裴一间，杨人杞、刘汇都各住一小间。报纸杂志则都放在饭厅内的书架上，可以拿到各人房间去看，但必须很快归还。

曦园的出现，正是“五四”运动轰动全世界的政治大风暴的产物。这时人们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民主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而曦园成员中，如易克嶷（每次大会的主席）、邓康、罗敖阶、张国焘、陈锡（“五四”运动中的会计）等，又都是“五四”运动中躬亲其事的骨干分子，对于由“五四”运动所激起的进步思想，更是趋之若鹜。因而一方面把当时风靡一世的进步性报纸杂志，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全国各地的同类报刊，都尽可能地广为订阅。又一方面组织同学努力阅读新的进步书籍。并规定能读英文者读英文书，能读俄、德、法、日文者即读俄、德、法、日文书。不能读外文者，即尽可能搜读中文译本。又规定每隔一个时期（一星期或半个月），就开全体会一次，由同人把读书心得扼要报告。有因事出京到外地去的，回来时，也要开会欢迎，并由被欢迎者报告在旅行中的观感。

当然，这时候大多数人对于所谓新的进步书籍，还有许多模糊不清、自相矛盾、以至混乱曲解的地方，例如他们借以向封建堡垒开火的武器，还是从资产阶级武库里搬来的东西，根本上分不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他们有的已经开始基本上站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但面对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流派，不免表现得无所适从，而企图向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原则学习，反映在他们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进化论。特别是张国焘的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得很露骨，他事事都希望自搞一套，好出风头，喜欢支配别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时候，陈独秀和胡适等在《新青年》上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同声响应，曦园也是文学革命的热烈拥护者。邓康在“五四”前，本是个“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的人（周方说的），这时却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非新书不读，非白话文不写了。有一次，我托朋友从长沙用三块光洋买来了一部王先谦注的《庄子》，刚从邮局取了回来，被邓康看见了，立即抢了过去，毫不留情地把它撕碎了，并且说：“到今天还在读这样的旧书，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大家每天除阅读报纸杂志外，读书、谈话、思考、写日记，几乎都是《新青年》等刊物提出的各种问题。

此外，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每个人书桌上都摆有一块三棱小木板，上面写着“五分钟谈话”的标语，意思是想借此告知来宾，不要多说闲话浪费时间。有了它，就可以起到封建社会中“端茶送客”的作用。我当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

今当分改秒，秒价值千金。

这种爱惜光阴的精神，直到一九二六年我到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看望邓康时，他还是坚持执行，没有变化。

第二，是“三W主义”。就是每遇到一件事必须首先对自己提出三个问题。即“What”、“Why”、“How”，也就是说凡事都要先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当时还有人把它比作孔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哩！

三、曦园公寓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联系

凡是参加曦园的人，大都抱有向前进、求真理的雄心，

也可以说大家都具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例如邓康就有一副作为座右铭的对联说：

清操励冰雪；赤手搏龙蛇。

这是他请常来曦园和他交谈的朋友刘仁静代为书写的。他们不仅有崇高的理想，而且还特别注意社会实践：

（一）主办了一个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团员共有三十九人。曦园成员参加者最初只有邓康、易克嶷、张国焘三人。不久，杨亦曾、刘克隽、吴汝明、吴学裴和我也相继加入。共分四组，每组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嗣以主任干事有阶级意味，特改为书记。大约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改选，以邓康、杨钟健为总务干事。每星期天都有专人负责讲演，讲演内容，大都是以宣传有关德、赛二先生的普通常识，打破封建旧礼教、旧风俗为宗旨。担任讲演者，除邓康自己和曦园成员外，还有不少北大各院系热心的同学前来参加。邓康接办后，会议决定除城市外，并注意到乡村及工厂去讲演，规定每月二、四、六、八四天；每次出发至多不得超过二队，每队不得超过五人；地点为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我参加了长辛店组，共有七人：邓康、杨钟健、张广鸿、罗运璘、刘正经、杨真江和我。

有一次，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我们组出发到长辛店和赵辛店，我们带着留声机和各种唱片，先到长辛店，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卖劲地讲演，结果只招来了几个小孩和几个妇女，讲不到两个人，他们看到留声机不开了，也就渐渐地散去了。又向西走，到了赵辛店，也只到了五、六个人，结果也没有讲成。但我们特别是邓康，一点也不灰心，

以后还是向郊外继续进行。

（二）参加并支持工读互助团。这时在陈独秀、李大钊先生领导下，有一部分无力上学而又热烈希望上学的男女青年，在北京大学东斋正对面租了几间房子，创办了一个工读互助团，一面从事劳动工作，一面到北大各院系自由选课旁听。劳动工作内容计有：

甲、开设饭馆一处，参加者有何孟雄、缪伯英、易群先、周方、傅彬然、施存统和曦园的吴汝明等。馆内一切劳动工作，完全由团员自己担任，不另雇用工人；资金由陈独秀设法筹措，约有一千数百元之谱。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又内部意见不一致，不到两个月资金用尽，无法维持，就倒闭了。

乙、打袜子和拆洗衣服。这是一部分女同学创办的，共有团员八人。其中六人是湖南稽田师范毕业的，还有一个江苏人和一个朝鲜人。姓名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对邓康介绍过，要我们把衣服交由该团拆洗以资两利。可惜不久，也和饭馆一样，无形倒闭了。

（三）参加国民杂志社。国民杂志社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它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这个宗旨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范畴，但在“五四”以前，却曾起了把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团结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的作用。它的发起人是许德珩等。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了《国民杂志》后，社员人数逐次增加，最多达二百余人。曦园同学加入者，计有邓康、易克嶷、张国焘、萧镇湘、陈

锡、刘克隽、杨亦曾等。第一届职员选举，易克嶷、张国燾曾被选为总务股干事，邓康为编辑股干事，萧镇湘为会计股干事。第二届职员选举，易克嶷被选为经理部主任，刘克隽为经理部干事。

（四）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鼓励同学到会内去听李大钊先生的学术讲演。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李大钊先生发起组织的。曦园参加者有邓康、罗敖阶、杨人杞、吴汝明等人。至于听讲，则差不多每次都是全体参加。

（五）筹办长辛店京汉铁路劳动补习学校。这是全国工人学校最早出现的一所，是由李大钊同志指派邓康和罗敖阶等负责于一九二〇年筹备成立的。常去任教的是吴汝明，他每星期六晚乘车到长辛店去，第二天星期日给学校上课，星期一早乘车回京。然后自己到北大听课。他的报酬，是由铁路发给长期免票（只限于京长间这一段路和这一个时间）外，另付生活费八元。有时候李大钊、邓康和罗敖阶及其他同学，也去讲演过。课本是临时编写的。这和后来规划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斗争，直到一九二二年罗敖阶负责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一九二三年组织“二·七”罢工运动，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六）组织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这时北京大学同学中组织了一个书法研究会，邓康也是组织者之一，会员有廖书仓、刘仁静等。

（七）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〇年一月为充当湖南省驱逐张敬尧的代表之一来到北京的。和他同来的有一位女代表，名叫李思安。初到时由北大同学发起在湖南会馆开会欢迎他们。毛、李作了湖南广大人民奋起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运动的报告。他从到达北京时起，直到七、八月离开时止，都住在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一座名叫福佑寺的喇嘛庙南院内。这时，福佑寺北院早已被租出作为学生公寓，我的表兄袁伯扬、三弟马式材（子谷）和其他邵阳、武冈、新化同学十余人都住在里面。南院是由毛泽东同志和喇嘛临时交涉开放的。他是邓康的老朋友，和罗敖阶则同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杨人杞、易克嶷、张国焘都认识。我也是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间路过长沙时，暂住在岳麓山下妫汭寄庐蔡和森家，由蔡母葛健豪同志介绍认识的。基于以上情况，这一次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就三天五天地不断到曦园来。主要是和邓康、罗敖阶、易克嶷、杨人杞等接触最多，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天。我看过邓康的日记（那是我们都写日记，并且还约定互相交换阅看，以期集思广益），对他们的谈话记得很详细。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谈。他俩和别的同学一样，对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都深表敬佩。他俩对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有同情。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还通过邓康的介绍，加入了该会。

毛泽东同志此时已决定返湘后创办两件事：一件是创立自修大学。据邓康说，这个名称还是胡适代为拟定的。另一件是继续办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是受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在长沙创办的，编辑部就设在岳麓山下的妫汭寄庐中。《湘江评论》每出一期，都要寄几十份给邓康。邓康收到后，立即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说：“我的朋友毛泽东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现已寄到，要看的请到文理法三院及各宿舍

的门房去买。”不到半天，就抢购光了。

有时，毛泽东同志也到罗敖阶和我的房间里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关于南洋建国问题。我们一致主张应该鼓励有志青年到南洋去，宣传世界主义，而不采取殖民政策。具体作法，则先从教育运动入手。俟有成效，则进一步联系各地华侨土著，一同参加。我并提出：“南洋者南洋人之南洋也”这一口号。这无疑是受了欧洲和会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谈话后，我甚至立即下定决心打算先到新加坡去当教员，连课也不上了。四处奔走，并到图书馆去搜集有关南洋风土材料，以便了解情况而利活动。这事只有罗敖阶知道，他是热烈赞成并支持的。不料就在这时，报上载有南洋归国代表余佩皋女士向中国政府请愿，要对英国颁布的《一九二〇年教育条例》，予以废除的消息。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内争不暇，无力对外。余佩皋失意而回。因而我也为教育条例所限，进身无阶，不得不把这个计划自行打消了。

四、曦园公寓的解散

曦园是一九二〇年秋解散的。由于邓康和杨亦曾、陈锡、刘克隽、萧镇湘等同时毕业，刘克隽、萧镇湘出国留学（刘到德国，萧到美国），杨亦曾在回家途中病死，杨人杞亦不满意北大功课进行太慢，早已申请退学，回到长沙，一面主办协均中学，一面自修。刘汇也毕业离开北京了。走了这么多人，一时补不起来，所以就只好宣布解散，各奔前程了。

曦园的成员是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是多样的。有的在

李大钊教育之下，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如邓康、罗敦阶、吴汝明等。有的则比较近于胡适一派，侧重于个人主义。我个人则一方面深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又一方面也很同情胡适提倡的易卜生的个性解放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前者发展成为后来的政治思想——和同论，后者发展成为后来的自我实现主义——自成论。

回忆梁湘芸烈士

陈新宪

一九二七年春节后，我从衡山去长沙向省委汇报工作，住在我的母校兑泽中学。一天晚上，我到寒假留校女生寝室去找相识的CY同学，这时刘淑云、熊茂淑、蹇先润、张维等在围炉聊天。刚坐下，刘国富、刘农俊、郑廷辉陪着两位女同学也来了。经刘、郑二人介绍，这两位女同学都是宝庆人，其中一位矮墩墩穿青色平江布学生装的就是梁湘芸。

梁湘芸同志其貌并不惊人，扁圆形的脸，黑黄色的皮肤，因寒风的吹拂显现出红润的光泽，特别是她那晶莹的眼睛，温柔的谈吐，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有时却又带着“宝古佬”的土气。我们拉开火盆，女寝室的主人们以花生米加清茶助长大家的谈兴。深夜了，巡逻经武门荷花池一带的更夫已连敲三声，此时窗外的寒风在怒吼，卖油炸豆腐的呼声不断地传进了女生寝室，熊茂淑拉起刘国富出去买油炸豆腐。寒夜的油炸豆腐加上红辣椒酱，围炉细嚼，别有风味，使我们的叙谈更热烈了。论年龄梁湘芸同志比我大两三岁，她是大姐，其他CY同学都只有十七、八岁，唯我与她是CP同学。

过了几天，我乘火车经株洲、朱亭至衡山，在朱亭上船时，走进统舱，地板上坐着的人群中传来招呼我的声音——“密斯特陈”。梁湘芸同志坐在靠外面的一个座位上，与她靠近的是一位酃县妇运特派员，一九二五年寒假我们在长沙新党员训练班学习时见过，这时她便接过我的公文皮包，把

坐垫的油布摆开让我坐在她的身旁。梁湘芸同志看我没有行李，便提议今晚讲“天方夜谭”故事熬夜。夜深漏尽，舱内四面的长凳上都坐得密密麻麻的，一个个东倒西歪，鼾声与舱外的风声，水浪拍击声，很有节奏地交织着，成为旅客的催眠曲。梁湘芸同志这时并未入睡，她先将自己垫坐的麻粗棉绒毯抛到我的身上，原来船上的人都是和衣而卧，或靠着板壁就着锅炉房放出的热气。我正在半睡半醒当中，忽然梁湘芸脱下棉上衣挤进妇运特派员的被窝里，而将棉上衣抛在我身上。啊！这怎么行呢！我即将棉衣抛回去，梁湘芸同志再一次抛过来。妇运特派员被我们来回抛衣而惊醒了，她坐起来把梁湘芸的棉上衣铺在我的双腿上，并说：“以衣衣人，这是我们同学应该做的。”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东方既白，我揉擦着双眼，把棉衣还给梁湘芸同志。她说：“还早哩，莫受凉！”我借故起身解手，在后面房舱门口碰着黄海秋同学，她是派到衡山来任妇运特派员的。我们在船尾甲板上眺望着湘江岸上的飞禽，梁湘芸同志走过来了，“密斯特陈，你昨晚没有睡，就进舱去休息吧；密斯特谭也起来了，你一个人去躺躺。”大家只顾吸着新鲜空气，并不畏寒。此时谁也不愿再进令人窒息的统舱。

过了一会儿，茶房叫着“蛋炒饭。”我说：“你们尚未到任，今天就归我请客吧！”梁湘芸同志说：“我领的治装费尚未动用分文呢。”我说：“你家里是否还需要你寄钱？”她说：“我家是在宝庆城做生意的。”并向我们介绍她家中的一切情况。她父亲曾从事书纸业，五四时期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他在办宝庆商务印书馆业务时，承担长沙文化书社的推销任务。《向导》、《新青年》、《中

国青年》、《战士》、《先驱》等进步刊物，每到书，即尽快陈列在书架上。她哥哥梁崇钦是宝庆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又是店员工会的委员长。她弟弟梁岑，甲工学生，我早已相识，在CY长沙地方委员会和省学联都共过事。他去年被派回宝庆任CY特支书记，这次参加工运训练班也派到湘南去了。故梁氏一门如梁崇钦、梁湘芸、梁岑等兄妹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梁湘芸这次是自己要求去水口山的。她很虚心地要我介绍工运经验。我说："顾群同志告诉我，你在宝庆城领导鞋帽女工闹罢工取得彻底胜利，影响很大。还听陈含明说，你带着爱莲女校同学去砸过妓馆，驱逐嫖客，教训鸨婆和妓女，轰动宝庆全城呢！"大家以钦佩的目光投到她身上。我真想不到，这样一位矮个子姑娘，一九二六年在支援宝庆县中师生驱逐反动校长刘长城、迎接北伐军、讨吴宣传活动中，在火烧英商福记煤油公司示威游行反帝斗争中，却每次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轮船抵衡山，我和黄海秋同志上了岸，梁湘芸和其他同志继续航行到衡阳，于是我们就暂时分了手。

这年"马日事变"后，我被调回宝庆协助贺恕重建党的组织，贺恕的爱人朱舜华从水口山调来。这时梁湘芸同志也从水口山调回来了。通过石鸾英的联系，我们在田迷石家又见面了。九月，湘西南特委开始筹建期间，梁湘芸同志特别忙，我和贺恕夫妇都是从外地调来的，过去没有在宝庆工作过，当时公开行动没有多大妨碍。但梁湘芸同志系在宝庆城土生土长，又在这里叱咤风云过一个时期，需要随时警惕敌人的追踪。于是她常化装为抽牌看相的，日夜奔走于城乡各

地，联系同志，发展组织。在策应秋收起义时，她带着一捆捆折好的传单，提着抽牌的包袱，走到龙山太芝庙我的家里，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在我大门口频呼算命看相。我出门相迎，九岁的妹妹也跟着出来。互相招呼后，我的姑母走出来便要算命。梁湘芸知道我家的详细情况。这时，她一本正经地坐在石凳上将“四柱八字”一摆，轮指推算，说得活灵活现。我姑母又惊又喜，便拉着她进门而坐。这一下惊动了我的妈妈和大姐，我姐姐抽了牌，妈妈抽了牌，还要看相。抽的牌大都很吉利，看相也看得准，说得对，于是满堂都很高兴。看看日已西斜，夜幕降临；于是我们全家留她晚餐过宿。我安排她和我妹妹住在一个房间，她趁机将湘西南特委的文件、宣传品及贺怒用药水写的信交给我。我回房用灯火烤现后，始知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立即把躲藏在我家后楼上的太芝庙乡农协委员长支部书记陈致青同志找来商量，如何到龙山矿区重建组织，开展工作。连夜又派陈定楚同志到冰塘请戴世荣到太芝庙面商。湘西南特委当时决定以龙山矿区、牛马司煤矿、新化锡矿山为工运重点，重建组织。组织暴动，这些地方也是军运重点，均驻扎有矿警。锡矿山和龙山矿区立即建立特区委，分别以陈历坤、戴世荣兼任书记，特委并指定梁湘芸、梁崇钦、刘健参加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军委工作。十月，我在龙山太芝庙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做掩护，梁湘芸和梁崇钦先后来过两次。接着矿山支部、扶锡支部继太芝庙支部之后恢复了组织，发展了党员。冬初成立特区委，梁湘芸同志没有到会。不久刘健来通知我，说湘芸同志被捕了。崇钦同志这时也被叛徒告发正被反动派通缉、搜捕，我们决定派他去矿山潜伏做军运工作。

春节前，传来梁湘芸同志慷慨就义的消息。据悉她被捕后坚贞不屈，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她都义正词严，痛斥新军阀的罪恶，使反动派束手无策，最后下了毒手。当梁湘芸同志被行刑队押赴大祥坪刑场时，沿途她高呼口号："打倒新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街上的群众频挥苦泪，而烈士昂首自若，视死如归。罪恶的枪声响了，烈士的口号声仍缭绕空际。烈士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